

[封面故事]

解读凌家滩

吴卫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明与社会、玉石器工艺、田野考古。凌家滩遗址发掘第二任领队，2008年~2018年负责凌家滩及周边考古工作

凌家滩神秘的玉版和肃穆的玉人，令人浮想联翩。而其背后的故事和凌家滩文化的兴衰历史，更值得探究。凌家滩文化开创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时代新风和社会复杂化之始，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身独特的贡献。凌家滩文化，当之无愧称为“文明先锋”。

说起凌家滩，神秘的玉版和肃穆的玉人，总是让人浮想联翩。而这背后的故事和凌家滩文化的兴衰历史，更是值得细细探究。

凌家滩遗址位于长江下游中段的含山县铜闸镇长岗行政村，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有一条唯一的入长江水道——裕溪河（后河），在五千多年前的裕溪河中游河北岸，出现了一处面积超过 1.4 平方公里的繁华之地，在被历史淡忘了五千多年之后，因为 1985 年 12 月初的一次村民下葬活动偶然重现。随后经过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四十年的工作，才逐渐浮现出它的原貌，精美的玉石器、明显的等级差异、大型的祭坛和燎祭坑，都展现了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因而成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文明先锋”，也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兴也勃，规划有制

凌家滩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五千八百至五千二百多年，它的兴起与衰落在本世纪初还是一个谜，如此发达的一个史前文化，真的是骤然一现又飘忽出历史？如果不是，它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的衰落是无影无踪了么？2008 年以来，经过近百人次五年多的全流域系统调查和 10 年的勘探、发掘，终于有了眉目，证实它的发达并不是一蹴而就，衰落也是有迹可寻的。

在凌家滩文化还没有出现之前的六千多年前，裕溪河上游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村落，但分布十分稀疏。到五千八百年前后，也许是环境趋好人口增加，或者是资源获取方面的原因，村落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形成了成群分布，虽然面积都不大，三四万平方米的村落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最大的凌家滩也没有超过 10 万平方米，但整个区域的兴旺之象已经呈现。大约



凌家滩遗址鸟瞰（自南向北）

笔者提供

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凌家滩在一众聚落中脱颖而出，面积骤然增大到近一平方公里，人口快速聚集，人们开始挖壕沟、兴居舍、治玉石，一派繁盛的景象。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凌家滩最后的面积已扩大到 1.4 平方公里左右，在东北面不远处还有类似“卫星城”。但在盛极之后，凌家滩文化于五千二百多年前一蹶不振，只留下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了解了这段背景，凌家滩文化的兴衰之路也就有些豁然清晰了。

凌家滩文化在繁盛之时，已经彰显了中心聚落的宏大和有序，整个聚落以南北向的山岗为核心，都经过了有序的规划，足以傲视全流域甚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在离河稍远的北边山岗最高地点，是与天地沟通、祭拜神祖的最佳场所，当时的人群在这里曾经举行过燎祭等仪式，并用石块在山顶铺筑出好几百平方米的祭坛，作为集体祭祀和埋葬逝者的场所，但在祭坛上和靠近祭坛的地方，并不是群体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埋葬的，只有当时的显贵或有一技之长的工匠等才能享有葬在这里的特权，而且可能还存在家族的区别。

在山岗最南端距河流较近的地方地势稍高，原先本是人群活动较多的区域，后来又用红烧土块堆筑了一米多厚、相对平缓的大片平地，上面没有密集的房屋，只发现了一处年代略早的长条形房址遗迹，应该是集体进行重要活动

的场所。

顺着山岗往东、西两侧，是比较宽阔的低平之地，适合日常居住生活和农耕生产，因此在沿河一带形成了较为密集的房屋、灰坑等生活设施，只是越往北远离河流，生活遗迹越少，总体上表现为狭长的东西向分布特点，类似现在南方地区传统的“沿河而居”。如果从小范围的分布上看，在山岗东侧被称为“石头圩”的地方最集中，遗存十分丰富的生活区便有十万平方米左右，而山岗西侧“石家圩”却明显较少，可能是因为从西北方向有向东冲来的河水，容易造成水患，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

为了防范外族或动物的侵扰，凌家滩文化在繁盛之初就设计开挖了一条内壕沟，几乎将面积近五十万平方米的生活区完全围护，但却将祭坛和墓葬等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场所隔离到壕沟以外。伴随着聚落的大发展，后来又在西、北方向距内壕沟 500 米远的更远处又挖了一条外壕沟，不过此时已到了衰落之时，内、外壕沟之间的大片区域并没有成为生活的新区，仅在少数地方人群的活动稍多，甚至外壕沟东半部也没有完成土方工程，成为“半截子工程”，至今还没有发现东、北部的外壕沟迹象。

治玉石，成就辉煌

玉石器制作是凌家滩文化最亮眼的产业。早在六千多年前的长江下游，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玉石器制作和使用已逐渐成为生产、生活的一大需求，在太湖周边的马家浜文化、钱塘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中，在木骨器使用的同时就有了一些能够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石器和少量具有装饰功能的小玉饰件，但玉器还没有成为被普遍使用的器物，更没有成为特殊的用品，多数使用途径还是日常生活中



凌家滩地形及聚落结构
作者提供

佩戴，并在墓葬中偶有随葬。到了距今 6000 年前后，今南京、镇江一带的低矮岗丘地区出现了一支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估计年代为公元前 4000 ~ 前 3000 年，距今已有 6000 ~ 5000 年的历史），接受了马家浜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遗址而得名，其年代约始于公元前 5000 年，到前三千八百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的玉石器制作传统而擅长玉石器制作，或因社会风气转变，在墓葬中开始较多随葬玉石器逐渐成为风潮，但器物种类、形态还不丰富，工艺上虽已有较大改进但也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其中斜钻隧孔、带凹槽拼接等技术较快地发展起来，圆角花斑石钺、玉璜和其他饰品的使用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长江下游，已经以长江沿岸为纽带萌生了大规模的文化东西向交流互动趋势，随后的凌家滩文化正是接力了北阴阳营文化玉石器制作传统，在裕溪河流域快速发展起来。

当时，整个中、东部地区都有崇尚动物神灵习俗，原始宗教得到了大发展，凌家滩文化在这个背景下创新出一批特征明显且不具有实用意义的玉器，并蕴含了十分神秘的气息，其中人和动物形象最受瞩目，它既与其他地区的



凌家滩文化 双虎首玉璜

长 11.9 厘米 端宽 2.5 厘米 厚 0.4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8:26

造型相似，又有明显的不同。

在凌家滩人的观念中，猪是十分重要的动物形象，他们不仅大量养猪，还用玉、石材料雕刻了很形象的猪形态，既有野猪也有家猪，并且偶尔将猪首嫁接到其他动物身上，如在展翅昂首的玉鹰两翼和长锥形的龙形玉器上，都雕刻出猪首形象，其中龙形玉器的猪首吻部较长、鼻孔清晰，十分形象；长七十多厘米、重达 88 公斤的巨大野猪雕像，长獠牙突显，也栩栩如生。虎也是凌家滩人特别崇拜的动物，在发现的动物骨骼中虎骨数量极少，但却制作出了数件玉璜，将虎首雕刻在璜的两端佩戴在身上，这种双虎首璜是具有深厚意义的产品，在 87M8 的墓中，甚至随葬了两件完全相同的双虎首璜。龙形象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象征，在凌家滩也发现一件，98M16 墓中的玉龙，器体扁平，首尾相衔，两角（耳）上耸，脊背上刻划出多道细线似鳞片一般，虽然首尾相衔的玉龙在时代相近的红山文化晚期和崧泽文化末期——良渚文化早期中都有发现，但这些文化中的玉龙都较厚实，雕刻也略显抽象。

人形象的再塑，也是凌家滩人尊祖观念的

表达，同时也兼含了借此敬神的意义。整个墓地中先后发现了姿态各异的玉人 8 件，有站有坐（蹲）有跪，完整的 6 件都双手上屈，神情肃穆，表现出与祭祀相关的姿态。

除了人和动物形象之外，凌家滩人还创造了一些神奇的玉器——刻纹玉版、刻神树状三角形器及其他刻纹玉器，至今仍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内涵十分丰富，现在还难以解读其中的奥秘。对于玉版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与古史传说中的“元龟衔符”或原始八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最早的“神面”，还有学者认为是原始宇宙观中的“天极”，更有不少学者认为与“五位九宫图像”“天文准线”有关，或者是中国最早的太阳历和宇宙模型。

器物形态的创新是凌家滩文化的一大特点，而玉石器工艺技术的发扬和较大改进更是凌家滩文化的特色，彼时的凌家滩工匠基本技术更加成熟，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从选料到切割、琢磨、钻孔、抛光的技术，阴线刻、减地、镂孔、掏膛展现了技术的多样化，实心钻、管钻技术已得到广泛的使用并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能够自如地钻出斜向的隧孔和直径 3 至 5 毫米左右

阅读链接

元龟衔符

◎ 《黄帝出军诀》曰：昔者，蚩尤总政无道，残酷无己。黄帝讨之于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黄帝仰天叹息，愀然而睡。梦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备后。得兵契信，战则克矣。”黄帝悟，思其符，立坛请而祈之，祭以太牢，用求神佑。须臾，玄龟巨鼈衔符出从水中，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亲自授符。视之，乃所梦也。于是黄帝珮之以攻，即日欠獯尤。

—— [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六“方术部十七·符”

阅读链接

天文准线

◎ 天文准线是天文考古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用于通过天文观测数据回推算天文设施的建造年代。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在天文设施上确定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从设施的中心点延伸到特定天文事件(如夏至日的太阳位置)的位置，从而确定设施的建造年代。

◎ 凌家滩出土玉版与日晷图案在结构相似，这表明早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掌握根据日出方位来辨别时节的观象授时方法。

◎ (关于凌家滩出土玉版上所刻为天文准线的分析，参见武家璧《含山玉版上的天文准线》，《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阅读链接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与“天极宇宙观”

◎ 《楚辞·天问》曰：“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这段内容记载了先秦时的宇宙观：天为圆形，有九层；天以天极为中心枢纽；天体围绕天极旋转。这种强调天极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的宇宙观，称作“天极宇宙观”。

◎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上的刻画图像，如同“天极宇宙观”的图解：两重圆圈表示天穹，长方形外轮廓表示大地，中心圆圈和外层圆圈间的八条“圭形纹饰”为连接两重天的绳索，同时表现八方。天穹外层伸出的四支“圭形纹饰”如同维系天地的四维。中心的八角星纹，正是天极的标志。(内容参见李新伟《史前“天极宇宙观”——从高庙文化陶器图像说开去》，《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0日第12版)

阅读链接

五位九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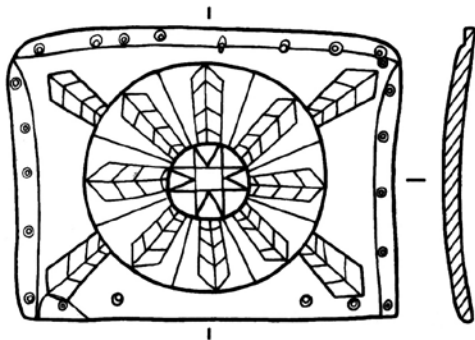
◎ 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即四方，在这四个方位的基础上加上中央位置，形成的就是“四方五位”系统，即五位。

◎ 在“四方五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方位分为八个方向(即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加上中央位置，形成的就是“八方九宫”系统。

阅读链接

凌家滩玉版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太阳历和宇宙模型

◎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龟的背甲是“上隆象天”，腹甲是“下平象地”，中间的玉版包括作为周围空间重要方位基点的“八方”，作为一年关键时间节点的“四极”，以及代表全年节序和日序变化的周边圆孔。从构图上来看，三者叠放起来后，玉版上代表八方的纹饰居于龟腹正中，代表冬至和夏至太阳出没方位的四个箭头则正好位于四个龟趾的位置，形成所谓“四趾转运应四时”的意象。这是世界上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太阳历和实物宇宙模型。(内容参见石云里《正在故宫展出的凌家滩玉版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太阳历》，《天文志》微信公众号，2024年12月27日)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上的刻纹线图

的小孔，还能通过更换大小不同的钻具，逐渐深钻而得到小而深的盲孔。在浅浮雕、半圆雕、圆雕方面也有明显进步，并率先使用了原始的镂雕技术，因而可以更好地让扁平的器物获得更有表现力的立体感和穿透感。齿纹的广泛应用也是凌家滩玉器制作的一大亮点，通过改变玉器外轮廓形状，增加线条的变化，使常规的形态获得了更丰富的表现，也是凌家滩文化大胆尝试的独特因素，这种打破流线型以求增强器物奇异效果的风格，在同时期崧泽文化陶器上也有体现，可能是这一时期共同的审美追求。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外缘饰连续密集齿纹的玉璜，便是典型的代表性产品，它与源自北阴阳营、盛行于凌家滩的另一种带暗槽的偶合式玉璜，曾先后沿着长江两岸向中游和下游有了远距离的传播，对整个长江中、下游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是，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和技术创新则处于初始阶段，在阴线刻、镂雕等方面还不发达，因此还是更多地通过“形”来展示其特点，偏重立体形态的表现，器表的平面刻划纹饰并不多见，“纹”的应用还显简约。



凌家滩文化 玉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204

外缘较直略鼓凸，残存几道旋切痕，外缘有一较深盲孔，口大底小，孔壁有旋痕，玉饰为玉芯再加工而成



凌家滩文化 管钻玉芯

直径 0.5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7M23:25



凌家滩文化 石钻

长 6.3 厘米 宽 1.1 ~ 2.5 厘米 厚 1.2 厘米

细钻头长 0.5 厘米 直径 0.3 厘米 钻尖长 0.1 厘米

粗钻头长 0.3 厘米，直径 0.6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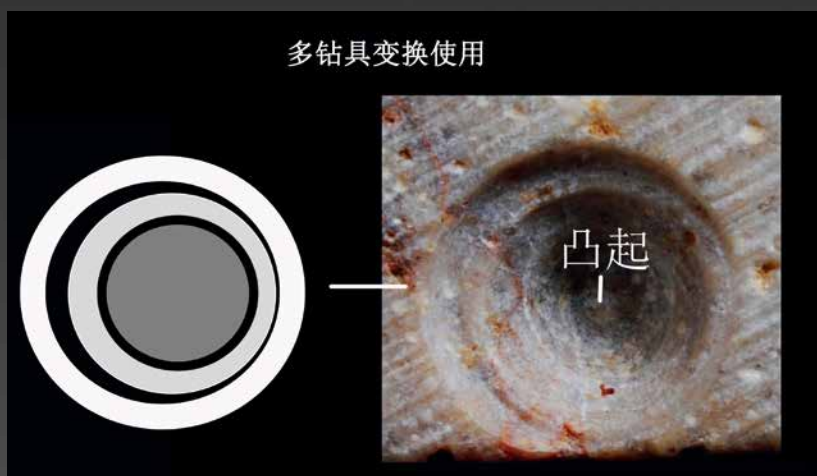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98M23:6

图片转引自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等编《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82 页



实心钻（扩）孔示意
作者提供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上展示出的多钻具变换使用成果
作者提供



崧泽文化 人首陶壶

高 21 厘米 圈足径 7 厘米

嘉兴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

《崧泽之美》，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 年

不满足于中规中矩的曲线，崧泽文化陶器有较多的亚腰形、折腹形变化，晚期陶器圈足上刻有多道缺口（即所谓花瓣圈形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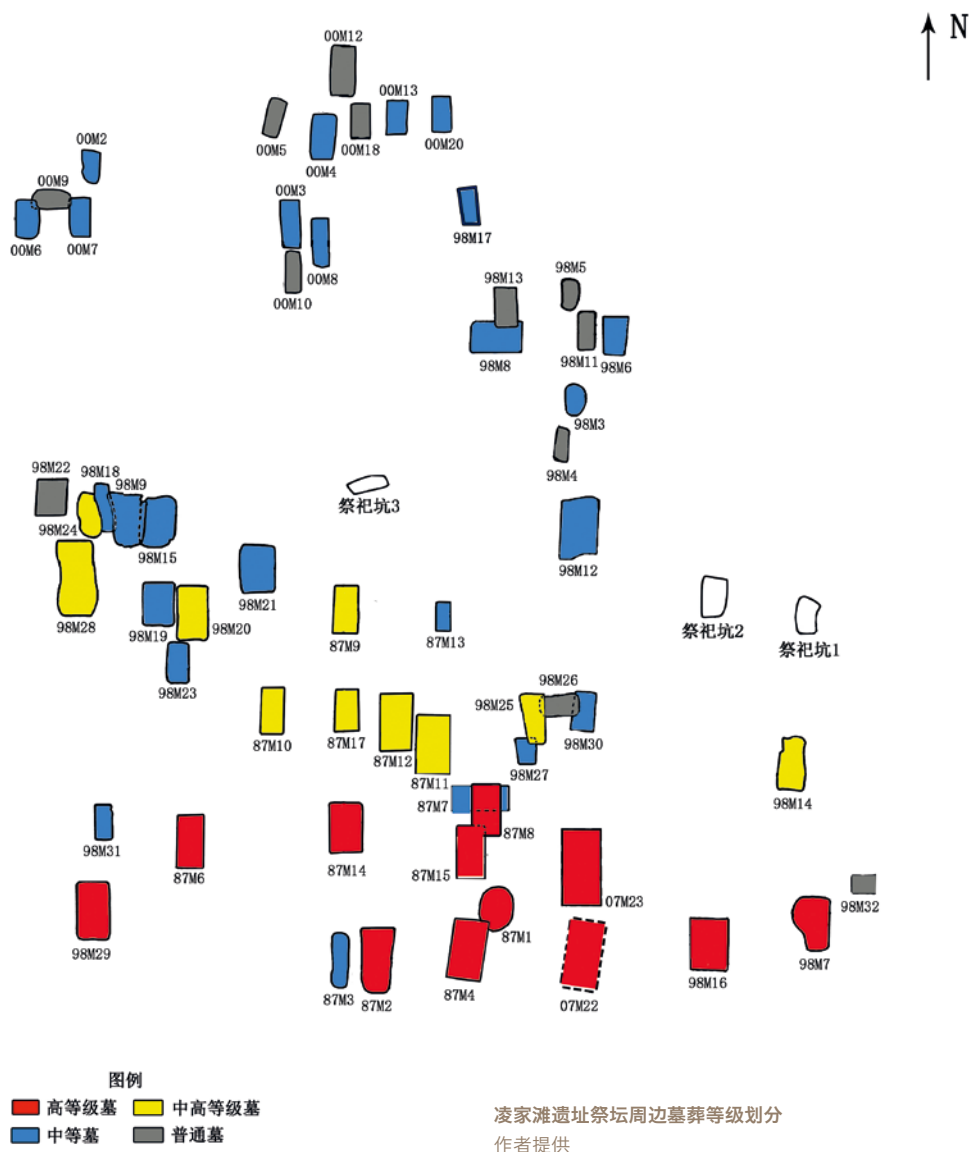


长江流域齿纹玉璜和偶合式玉璜分布图

作者提供



凌家滩文化 齿纹玉璜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00M21:1



创礼规，凝聚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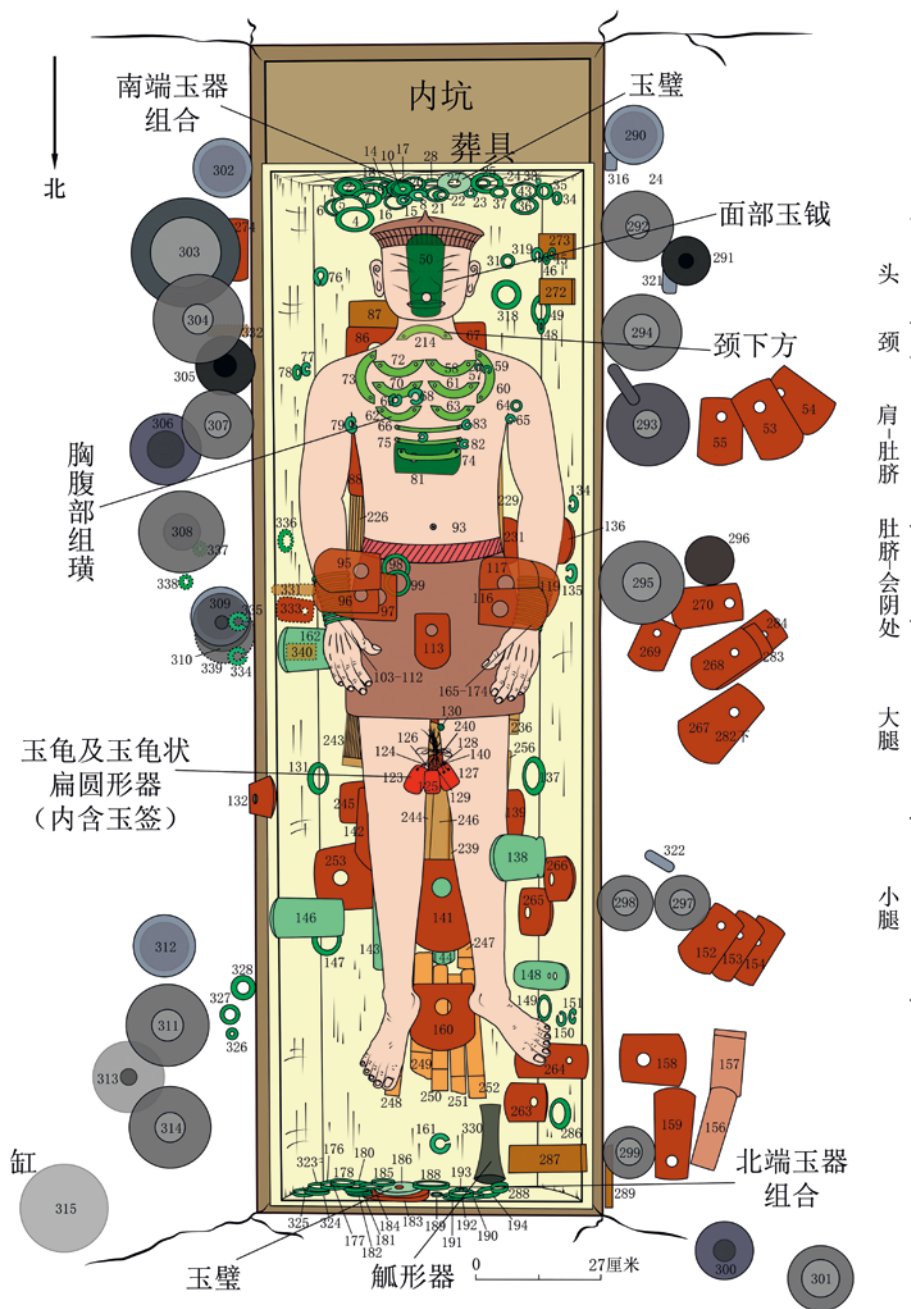
礼仪规制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更早的史前社会中，祭祀场所大都是分散而小型的，红山文化独立于聚落之外的石构建筑和祭坛，是较早出现的独立、集中开展祭祀等活动的大型场所，凌家滩文化的大型祭坛和高等级墓葬集中埋葬，同样是这一时代发生巨变的反映，它使得社会成员与天地和神祖的沟通从散漫走向了有序，并可能出现了祭祀权的专属性，从

而产生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不同墓葬排列位置的不同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的巨大差异，说明社会已出现了分层现象。一系列规制开始在凌家滩文化萌芽并逐渐形成礼仪制度。

在祭坛的南侧，集中分布了最高级别和较高级别的墓葬，西侧是以掌握了玉石器制作工艺技术的群体为主，北部则是较多的普通墓葬。随葬品数量最多者如 07M23 达三百四十余件，其中仅玉器就超过 200 件，而随葬品少的仅几件。随葬品的摆放也已出现了相对稳定的规制，以

玉璜、环为核心形成了成套的礼仪用器，特别是以多件玉璜组成的“组璜”开启了中国古代“组璜”用器的先例。其中一部分还随葬了玉人、龟、鹰、龙等特殊玉器，应是少数高级别群体专有的物品，服务于特殊目的。

除特殊器和装饰类玉器外，玉、石钺的摆放也反映出较强的规律性。多个墓葬中的玉钺基本上在棺内，而石钺在棺内、外均有，大都呈一线排列，在高等级墓葬中还有较大玉石钺压在墓主人的身上或身下。石钺作为木作工具并



凌家滩遗址墓葬 O7M23 的葬品分布与葬仪复原

此图绘制依据甘创业《凌家滩墓葬的葬仪研究》，《东南文化》2022 年第 3 期



凌家滩遗址墓葬 98M20 内的玉石铍（绿色块标出）排列
作者提供

不显眼，长江下游的同时期较多墓葬中都会随葬这种器物，但其在凌家滩文化中或具有特别意义，包括最大的 07M23 在内的多个墓中都随葬了数量较多的石铍，且有序摆放。

最独特的当属玉龟的使用。在凌家滩墓地中只在最重要的两座墓（87M4、07M23）中发现有玉龟，其中 87M4 的一件玉龟最逼真，是对真龟的完全仿制，从出土情况看可能是与刻纹玉版合用的某种法器。在其旁边的 07M23 则发现了一组三件玉龟（或龟形器），拴在墓主的腰部呈下垂状，只不过与 87M4 的玉龟相比较为简化，与玉龟相伴的是里面都有似尖首圭状的长条形玉器，这种长条形玉器在 87M4 中也有一件，虽然不是出自玉龟中间但也应是同一套用器。《礼记·曲礼上》：“**龟为卜，策为筮**”，占卜用龟、占筮用蓍，在古代社会占卜是人与神交流的特殊途径和方式，遇大事必占卜，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以龟为中介的占卜形式也是重大行事前的重要仪式，有文献记载的古代占卜



凌家滩遗址墓葬 98M30 内的石铍摆放
作者提供

活动都有专门的人群实施，直到近代的很多族群中，也都由萨满巫师来完成，是不能被一般人所行使的特殊权力。凌家滩文化数量极少的玉龟只出于最重要的墓葬中，当是反映了沟通神祖、祈求福祉的占卜活动只能由个别人行使，从而体现出社会凝聚的特征。



凌家滩文化 玉龟形器及玉签

玉龟形器背甲长 6.3 厘米 腹甲长 4.4 厘米

宽 5.5 厘米 高 4.2 厘米厚 0.4 ~ 0.8 厘米

玉签长 5.7 厘米，宽 0.9 ~ 1.3 厘米，最厚 0.65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玉龟形器编号 07M23:125，

玉签编号 07M23:126

图片转引自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等编《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163 页



凌家滩遗址墓葬 07M23 中的玉龟出土现场

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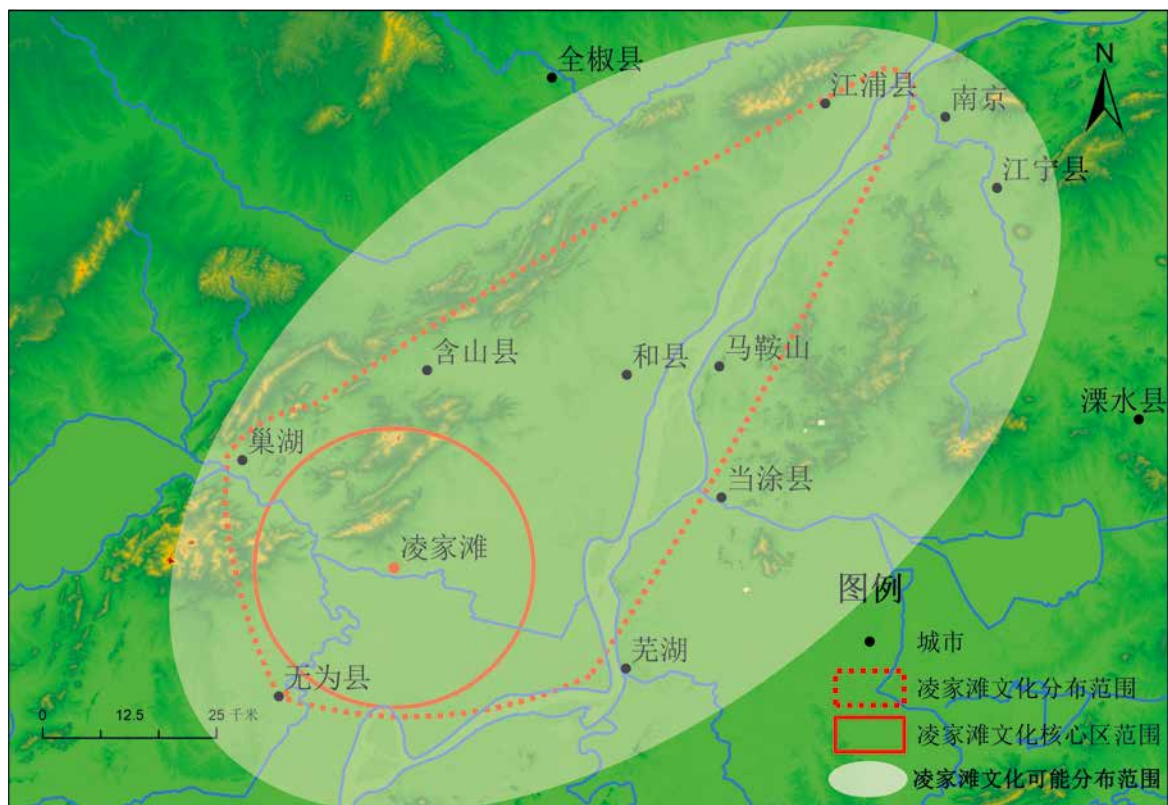
传四方，引领潮流

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是长江下游五千多年前十分突出、特征鲜明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的主要分布范围是以裕溪河流域为核心，大体顺着巢湖到南京浦口一线的西南至东北向大别山余脉的东南侧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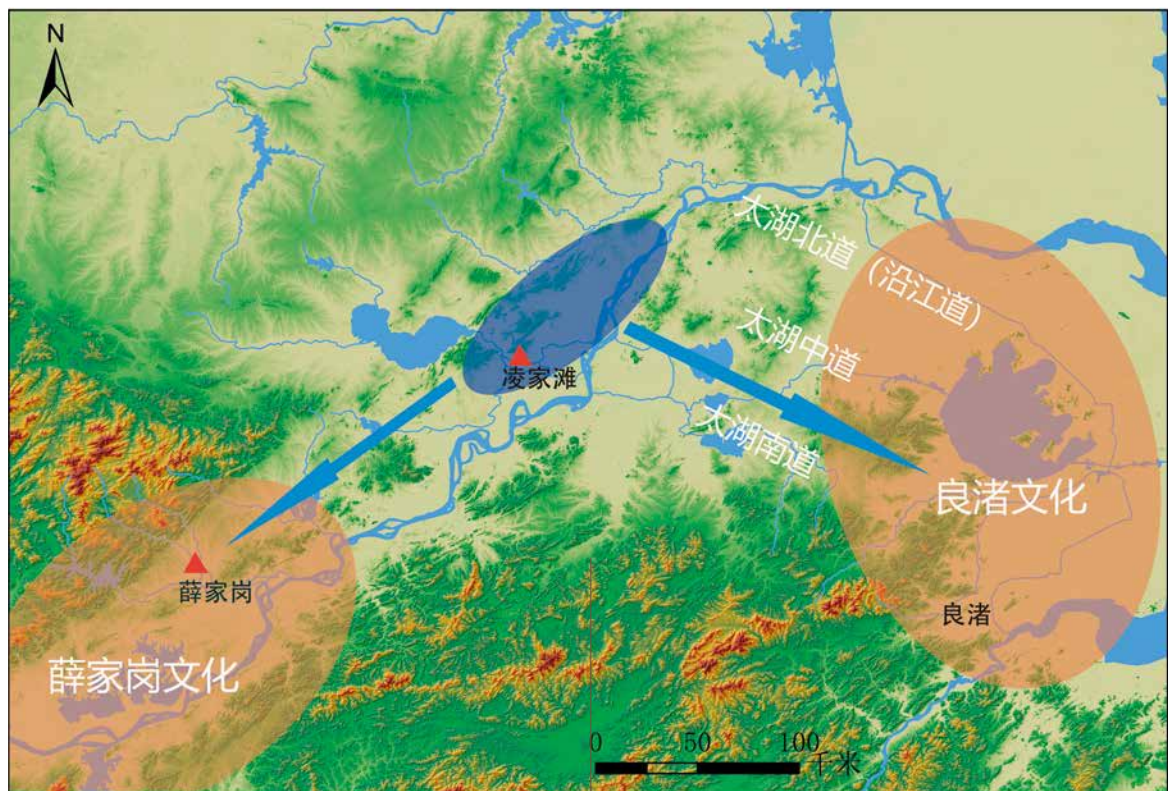
在其发展过程中，早期曾经吸收多种文化因素，晚期发展起的玉石器制作产业则傲立于长江下游诸文化之中，成为中东部地区的重要代表性文化。齿纹璜、出廓璜、虎首璜、钻孔加暗槽工艺的偶合式璜、花斑石钺这些最具特征的玉器和镂雕等工艺，也开始了对外传播、辐射的历程。

十分巧合的是，正当凌家滩文化衰落之时，东南方向天目山北麓、太湖以南的良渚文化早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玉石器制作，西南的大别山东南麓、鄱阳湖以北的薛家岗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因发现于安徽省潜山市王河镇薛家岗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南麓、鄱阳湖周边的皖西南、鄂东和赣北部分地区。年代约在公元前 3500 至公元前 2600 年左右）晚期原本并不发达的玉石器制作也突然有了大发展，两区在器物形态、工艺技术上都与凌家滩文化有明显的承接关系——特别是镂雕、齿纹璜、花斑石钺等特殊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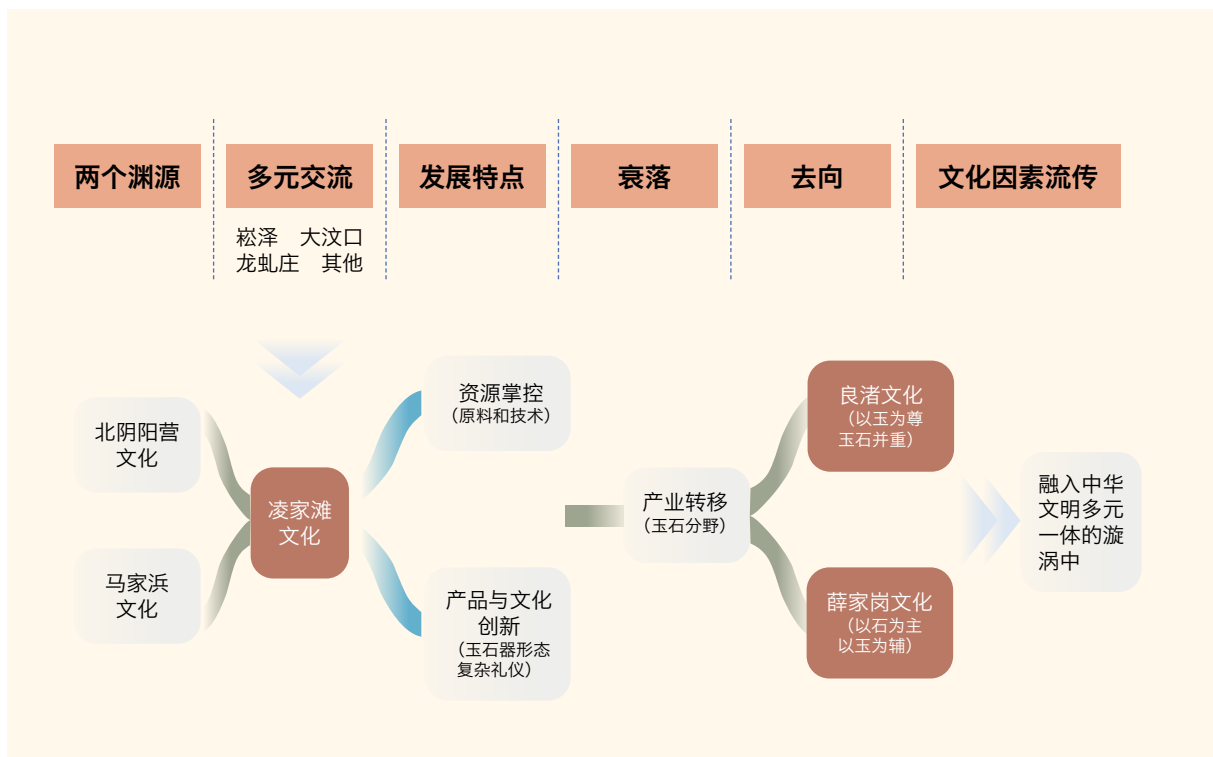
“玉石并重”的凌家滩文化在衰落之后，在此前已有的传播、辐射大趋势下，文化因素通过传四方完成了它重要的使命，最终实现了长



凌家滩文化分布范围 作者提供



推测的“玉石分野”路径示意图 作者提供



凌家滩文化发展路径示意图

底图转引自吴卫红、刘越《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13页

江下游史前社会影响深远的“玉石分野”现象：良渚文化早期突出了“以玉为尊，玉石并重”，更多地发展起玉器制作；薛家岗文化晚期则“以石为主，以玉为辅”，更多地发展起石器制作。

以凌家滩为时空节点，长江下游玉石器制作逐步完成了从起步到高峰的过程，既是从马家浜文化以来的上一个千年传统的延续，又启动了到良渚文化的下一个千年传统的开端。

凌家滩文化在同时期文化中独树一帜，拥有了从开料到加工成形的几乎全部技艺，使玉石器制造达到了史前时期玉石产业的第一个高峰，成为当时长江中下游最发达的治玉中心。广泛的用玉习俗反映了“尊玉”观念得到极大的增强；各种神秘的玉器表明当时的宗教信仰已出现了复杂化；大型祭坛和排列有序的高等级墓葬，显示了相对固化的祭祀场所和趋于稳

定的葬仪；随葬品数量和质量等级差异，体现出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早期小聚落繁星点点到凌家滩超大型聚落一枝独秀，也说明了社会级差的产生以及区域中心的形成。这些现象充分地显示出凌家滩文化已经迈上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凌家滩文化开创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时代新风和社会复杂化之始，已具备了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引领了长江下游此后千余年以玉石产业为主导、以丰富的精神内涵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道路。凌家滩文化的若干文明要素，都在传承接力中持续发展下去，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身独特的贡献。

凌家滩文化属于中国“古国时代”的最早期，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文明先锋”。